

国内全球化理论研究的进程、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吴怀友

(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我国学界对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有十余年历史,它大体上经历了从学者倡导和进行全球化基础性理论研究的准备,到政府重视、科研和出版机构推动的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开始,再到全球化理论研究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这样几个阶段。在我国全球化理论研究高潮迭起的今天,对其研究的进程、出现的成果、阶段性特点,特别是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作一番梳理,有助于推动全球化理论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全球化理论;人类现代化;全球意识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4-0532-06

一、国内全球化理论研究的进程与阶段性特点

西方世界首先兴起的全球化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传入我国,并迅速对我国学界产生影响,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迄今,我国的全球化理论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开始、蓬勃兴起和快速发展这样几个阶段。

中共十四大召开至1996年,是我国全球化问题研究的倡导及其基础性理论研究阶段。西方社会的全球化思潮之所以能够迅速传入我国,这得益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所形成的客观环境。当时我国正式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社会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和现实的反思及其引发的关于人类环境、资源、气候、生态、人口、伦理等全球性问题理论研究成果的翻译引进,和我国部分学者对该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则奠定了全球化理论在我国传播的思想、学术基础。早在八十年代初,国外有关全球化方面的文献就开始在我国传播,如,1981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争取世界的生存》,1985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英]汤因比和[日]池田大作合著的《展望二十一世纪》,1988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日]池田大作和[意]奥锐里欧·贝恰合著的《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展望出版

社翻译出版了[意]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田志力主编《全球开放论》(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等。199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来华系统介绍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德里克教授的演讲稿稍后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并立刻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1](183)}。一些敏感的中国学者对此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一方面陆续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提醒中国学者应当对此及早进行研究。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可以说是我国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发源地和主阵地。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南开大学蔡拓教授等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倡导全球化研究、并身体力行的著名学者。李先生早在1991年和1992年召开的中国拉美学会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五百周年的两次会议上就提出全球化时代业已开始。此后在《战略与管理》、《太平洋学报》等杂志上著文倡导进行全球化研究。蔡教授于1993年主持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全球问题”研究,“是国内较早提出系统研究全球化问题、树立全球意识的学者”^{[2](281)}。此外,庞中英、陆亨俊、童大林、黄平、王逸舟、李惠国等也是国内较早进行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在学术专著方面,除蔡拓等著的《当代全球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外,对于全球

收稿日期:2005-06-17

作者简介:吴怀友(1964—),男,安徽宣城人,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2003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全球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化基础性理论——全球性问题研究的专著,主要还有倪世雄的《战争与道义:核伦理学的兴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伟主笔的《生存与发展:地球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余谋昌和王兴成合著的《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卢凤的《人类的家园——现代文化矛盾的哲学反思》(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我国对全球性问题研究的学者不多,成果较少,但他们的艰辛探索和基础性工作,为国外全球化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1997年到2000年,是国内学者对国外全球化理论的大量翻译、传播和研习阶段,是我国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正式开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有力推动了国内学者及政策分析家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这时起,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日渐增多,有关国外全球化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有选择地翻译出版。199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全面反映国内外学者最新成果的“全球化论丛”:《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等。虽然该丛书大部分内容介绍的是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大多数作品都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一般性论述,但它的出版对国内全球化问题研究热的到来无疑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外,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译著还有1997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美]E.拉兹洛的《决定命运的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孔汉思、库舍尔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芭芭拉·沃特·勒内、杜博斯合著的《只有一个地球》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汉斯·彼得·马丁等著,1998年版)、《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里斯本小组,2000年版)、《经济全球化》([法]雅克·阿达,2000年版)、改革出版社出版的《不要惧怕经济全球化》([德]奥斯卡·拉封丹,2000年版)、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的十大谎言》([德]格力德·博克斯贝格,2000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的管理——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乔治·洛奇,1998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美]罗兰·罗伯森著,2000年版)等。这期间我国学者对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认识有所深化,出现了尹希成

等的《全球问题与中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赫永平和冯鹏志的《地球告急》(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熊飞和樊海林的《地球大村落》(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苏长和的《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新的学术成果。2000年,中国入世在即,一些科研院所、重点高校和新闻媒体纷纷就加入世贸、融入全球化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总的看来,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出版机构的推动,加快了学界全球化理论研究热到来的步伐。引进、翻译、介绍国外的全球化理论观点是这一时期我国学界的一个重要特色;国内学者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以“全球化”为题的论文共计2454篇,年均超过六百篇,并出现了一批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学者及其专著。如,丁一凡的《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伍贻康的《全球村落:一体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张汉林和刘光溪的《经济全球化世贸组织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碧琼的《经济全球化:风险与控制》(中国出版社1999)、房宁等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侯若石的《经济全球化与大众福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韩德强的《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等;至于政治、文化和全球化系统理论研究的专著尚未发现。学界联系到亚洲金融危机,对全球化,特别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对全球化概念、性质、特征、内容、成因、动力、趋势、利弊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中全球化(确切地说是指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及我们的应对策略,是学界重点研讨的内容。

2001年至今,是国内全球化问题研究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的阶段。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全球接连不断的金融危机,国家事务或一国问题的全球化发展,反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等,加上各种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接连不断,特别是由于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认识,引发了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极大兴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精心推演主题出版”新理念,《全球化论丛》II、III、IV和《全球化译丛》接连出版。正如俞可平教授在《全球化论丛(II)》总序中所说的那样,与《全球化论丛(I)》相比,这些文献有两个特点:其一,大部分内容反映的

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二,这些作品已不是泛泛而论,而是专门性的研究成果^{[3][2]}。其中的相当部分内容反映了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前沿理论。除中央编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外,我国其它一些重要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都把全球化丛书或论著、译著列为出版的重点书目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等一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为全球化理论研究搭建了广阔的学术平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学界涌现了一大批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和成果,主要有“全球化论丛”中的《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俞可平主编)、《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杨雪冬著)、《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俞可平等著)、《全球化:中国道路》(李惠斌主编)等。不仅如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出版了俞可平的《全球化与政治发展》,李黑虎、潘新平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江时学的《金融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谈世中等主编的《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余永定、李向阳主编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华孔子学会、云南民族学院编的《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程光泉主编的《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包括《全球化与现代性》、《全球化与文化整合》、《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全球化与经济安全》、《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八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全球化与中国的应对丛书》五册,包括《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蔡霞著)、《全球化与中国教育》(王啸著)、《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冯玉军著)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薛晓源、王治河、李其庆等主编的《国际学术前沿报告·全球化研究系列》(七册)。其他重要的著作还有不少,如马陵的《疆界的终极:全球化》(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雷达和于春海的《走进经济全球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张汉林的《强国之路——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及政策选择》(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年版)、贺金瑞的《全球化与交往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吴兴南和林善炜的《全球化与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杨伯淑的《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蔡拓等的《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鲍宗豪的《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庞中英主

编的《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理解全球化的复杂性 with 多样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郁建兴的《全球化:一个批评性考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马也的《谁是历史的朋友?——全球化:定义、方法论和走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叶江的《大变局——全球化、冷战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黄宗良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饶戈平主编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另据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网(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提供的数字,这期间(四年多时间)发表的以“全球化”为题的学术论文一万多篇,年均数相当于第二阶段四年总和。

如果说第二阶段主要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通过对“历史上的全球化”和国外全球化理论研究成果的参照和思考,主要探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和利弊得失,那么,这一阶段则随着全球化实践的发展,学界对全球化认识日趋深入,研究领域拓展到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生活等全球化理论的方方面面,研究成果丰硕。学者们重点结合国内外理论成果和中国全球化实践,开始把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换言之,开始了全球化理论的“中国化”工程。几乎所有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和学者,积极参与全球化讨论,研讨全球化对本学科带来的挑战,探讨适应全球化时代条件下本学科发展的使命和未来走向。这一阶段国内全球化研究至少呈现以下明显特点:

一是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现在全球化理论不仅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文学、教育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热门话题,而且广泛渗透到技术科学、医疗卫生、绘画艺术、军事科学等专业领域,并对许多传统学科的理论观点、内在结构产生了重大冲击和震撼,一些以全球化或与之相关联的新的学科名称、研究方向开始出现,如,“转轨政治学”、“全球社会学”、“全球伦理学”、“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全球化与党的建设研究”等。有学者开始以全球化为主线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结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进程的具体实践和要求,探讨全球化对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作用；还有的不满足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偏见与短视，致力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其进行一番认真地清理。就学理意义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全球化理论是继马克思主义思潮、现代化思潮之后的又一个能够对我国学界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学术思潮和学术理论。

二是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的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变迁过程。众多的学科从不同领域、不同视角、不同维度进行研究，使得全球化理论纷繁复杂。特别是国外各种全球化理论观点和学派的主张在我国广为流传，更是增添了全球化理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正如俞可平教授所说：“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在全球化理论中，不用说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像新左派理论或新右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社群理论等，我们都可以从中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声音。”^{〔4〕〔2〕}随着反全球化运动的全球化发展，反全球化问题研究成为这一时期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不同的思想、观点相互碰撞、交锋，学者们在比较中取舍，在争论中深化认识、走向成熟。

三是与国际全球化理论研究的互动性。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全面了解国际社会的全球化理论，正确认识全球化道路，已成为我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自1998年5月中央编译局当代所和深圳大学等单位在深圳联合举办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全球化问题研讨会后，从2001年始，我国主办或承办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增多。如，2001年在河北举办了“全球化与21世纪国际论坛”、在武汉举办了“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2002年在杭州召开了“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国际研讨会等。此外，在国外召开的关涉全球化问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我国学者也是与会者踊跃。至于国内科研院所举办的各类有关全球化问题学术研讨会更是乐此不疲。尽管目前我国全球化理论研究与西方社会相比，尚处于话语弱势，但在我国举行的全球化问题国际研讨会与在世界其它地区召开的全球化问题国际性学术会议，彼此呼应，相互促进，

从而使得中国这个全球化后发国家在其理论层面能够与国际保持紧密、互动的关系。

二、国内全球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努力方向

纵观国内学者全球化理论研究的现状和成果，可以发现，在全球化理论研究中，特别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尚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进程看，我国学者对全球化基础性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不够，对全球性问题认识不深。西方学者对现代化道路的重新审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引发了对全球性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研究，促成了人类“全球意识”的觉醒和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西方学者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初具规模，七、八十年代达到高潮，而我国学界对此类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90年代方才起步，迄今成果寥寥。与西方全球化理论和思潮源于对全球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不同，我国学者对全球化理论研究一开始就具有全面性，其起点较高，这是好事，但这也存在着对全球化基础性理论、全球性问题研究重视不够、认识不深的现象，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学者对全球化问题的事实判断和学理证明，而多于价值判断、情感表达或政治性取向。研究成果趋向表明，西方全球化理论和思潮正是源起于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反思、觉醒以及对全球性问题认识的深化、升华。从单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走向人类整体性的全球化建设运动，无疑是一种质的飞跃。我们注意到，大凡对全球性问题有所研究的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认识要全面、深刻得多。所以，我们要积极利用全球化时代文化资源共享的便利条件，充分重视和大力借鉴外来全球化基础性理论研究的有益成果，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加强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后发优势，做到后来者居上。

（二）从研究现状看，我国学者受西方全球化理论观点和学派主张影响过深、过大，对西方全球化理论成果缺乏系统的分析和科学地把握。无论是就宏观层面、微观层面，还是中观层面；也不管是历史学派、现象学派，还是未来学派；抑或是全球化的极端主义者，或是变革论者，还是怀疑论者，西方全球化理论讲究实证性、逻辑性和严密性，因而具有相对的

深刻性、合理性和现实性。国外全球化理论的多样性、复杂性乃至矛盾性对我们深化对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认识提供了帮助和借鉴。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全球化理论中也不乏、甚至是充满着意识形态的陷阱和话语霸权,如,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是纯客观的自然演进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实现、是一个神话抑或是陷阱等,其片面性、主观性、不彻底性也是客观存在和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往往会成为外来全球化理论观点的“传声筒”,或者是对国外全球化理论观点的“搬运”、罗列和“改头换面”。现在学界似乎有一种倾向,就是有意或无意避谈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是我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事物或现象的根本法宝,是迄今为止我们科学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理论的最有效武器。对于国外全球化理论学派诸多争论不休的理论命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来分析,往往不难得出结论性认识。

(三)从思维方式看,我国学者深受传统的“中—西”范式、简单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和静态的思维方式和影响和制约。全球化首要的是确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思维观念和思维方式。从词源学考察,“全球化”(globalization)源于“全球的、全球性的”(globe)一词;“化”,是指动态的“过程”。既然是全球的、整体性的,全球化就是建立在“全球性”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和全球国家的共性化和整体性变迁过程和发展趋势,是一个涵括全球性组织(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区域性组织、跨国组织(经济的、文化的)、民族—国家、个人及群体组织、无形组织(全球通讯、网络系统)等多要素、多层次的紧密关联、整体互动、有序演进和多模型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内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面上影响、作用于其它元素。这时如果我们仍习惯于把任何事物看成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可能就显得不够、失之于片面。其实,现实世界恐怕尚不存在只有两面性的人和物。所以,传统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亟待转换和拓展。用哲学话语说,在全球化时代,思考问题不只是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的问题,而是要一分为三、为多,合多为一,要有普遍联系、辩证发展、矛盾运动或系统性、整体性、多维性、过程性思维观念。

(四)从研究方法看,我国学者大多注重应然性研究和价值判断而疏于“应然”与“实然”、价值判断

与事实判断的有机统一。做学问有一个方法论问题,中国传统的说法是要“实事求是”,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要处理好“实然”与“应然”、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程光泉先生在《全球化焦点丛书》总序中说得深刻:“对全球化,人们有着不同的观察视角,也就有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见仁见智,本不足奇。但人们在对全球化的实际进程并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不是进行事实分析,而是急于作价值判断,这本身也是不严肃的。”^{[15][8]}事实上,我国学者曾经热衷的、且喋喋不休的,诸如全球化是机遇还是挑战,是陷阱、悖论还是福音、神话,是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等此类“似是而非”的问题,正是基于对全球化的“实然”的不正确判断之上的。这其中既有我们受中国传统的“楼阁式”研究方法的影响、对全球化基础性理论研究不足和对西方全球化理论学派缺乏全面认识等原因,也有受到某些理论命题标新立异而误导之故,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运思方式和所应用的研究方法”问题。所以,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一切从事实出发,从“实然”中求证“应然”,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在“实事”中求“是”。

(五)从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看,我国学者往往对全球化现象真假莫辨,喜欢用全球化来解释人类社会的一切历史和现象。全球化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高度互动,从而使全球化现象五彩斑斓。其中有的属于全球化现象,有的则不属于全球化问题,有的是全球化的客观真实,有的则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假象或人为干扰。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纷繁复杂的表象中揭示事物的本质,抓住主要矛盾,认清事情的主流,要对各种主观人为的或客观形成的干扰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和遮蔽了双眼,更不能把假象当作事实真相或事物的本质。必须承认,目前的所谓全球化,在现实方面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处于有利地位,在理论方面西方社会也处于话语优势,这是一种真实;这其中有少数国家,如美国利用全球化搞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企图主宰全球化进程,把全球化变成美国化,这是对全球化的严重歪曲和肆意猥亵,是地地道道的反全球化现象,这不是全球化的真实和全球性发展趋势。它必然且事实上已经受到包括西方国家和本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的不同程度的、然而又是一致的反对和抵制。这是另一种事实的真相。全球化是客观历史进程和主体选择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是一项关涉全人类的建设性事业,需要全人类共同行动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其中必然交织着建设进程的快

慢、建设与破坏的矛盾和斗争,但全球化建设无疑是全球化事业的主题和主流。只有对全球化形势有一种科学的判断,我们才可能对它有一个较为客观和合理的认识,才能说是抓住了全球化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的本质,才能在全球化实践进程中不迷失,在全球化理论研究中不迷惑,才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所作为、有大作为。

(六)从研究内容看,存在着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不够,全球化理论研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脱节,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研究之间失调的现象。如有的一味纠缠于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和命题而忽视客观现实。对全球化概念的把握固然是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基本点、出发点,但忽视全球化丰富的现实内容,不确定概念就怀疑或诋谈该客观存在的事物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概念只是一种符号、标签,是相对静止的,而概念的现实内涵是具体的、丰富的、不断变化的。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经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它常被用来比喻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其实用它来表述概念与内容的关系再恰当不过。“河流”是概念、是相对静止的,“水流”是内容、是永恒变化的。又如全球化起点问题,许多学者把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联系起来,这就必然导致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西方中心主义”化、甚至美国化。那么,就出现了对中国主动选择、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现实解释不通的问题。再如为什么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强调“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而不是将提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并提,前者是否意味着对后者的否定?常听到有人说,

政治、文化怎么“全球化”法。其实,这是我们党基于一种工作策略和方法论的考虑,把宏观战略与微观策略相结合的典型命题。如果没有政治全球化的制度保障和文化全球化的理念支撑,经济全球化只能是无序化和危机化,最终“化”不起来。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否认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性和区域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同理,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也并不是否认政治的、文化的全球化客观存在和发展趋势。换言之,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是全球化运动的现实要求和基本内容,是对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是全球化建设的现实步骤,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原理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共性与个性关系原理有机结合的娴熟运用。诸如此类问题的研究,都需要我们在全球化理论研究中增强系统性和整体性认识,把全球化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全球着想,从本土着手”(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应当成为全球化理论研究者共同遵循的准则。

参考文献:

- [1] 俞可平. 全球化与政治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2] 杨雪冬. 全球化: 西方理论前沿[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3] 俞可平. 全球化论丛(II)总序[A]. 李惠斌. 全球化: 中国道路[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4] 俞可平. 全球化主题书系总序[A]. 曹天予. 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5] 程光泉. 全球化焦点问题丛书总序[A]. 李晓东. 全球化与文化整合[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Cour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domestic globalization theory research

WU Huaiyou, ZHOU Tao

(School of Law,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researched globalization theories over the decade in China which experienced such phases as scholars initiated and prepared for basic globalization theory research, to the one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romoted by the press, and then to its springing up and explosive growth. When domestic globalization theory research upsurges repeatedly, we need to seriously comb the studying course, the scientific payoffs and characteristics by phases, especially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conduce to the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theories; human modernization; awareness of globalization

[编辑: 颜关明]